

# 原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魏礼群教授谈治学与从政—— 紧跟时代 扎根国情 求真出新

魏礼群

## 思想人生②

1968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作为学生党员,我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被分配到蒙古牙克石林业管理局工作。在林区的10年,生活极为清苦,这反而让我心无旁骛,抓住一切机会反复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资治通鉴》等古典名著。还因经常为林业管理局领导写讲话稿和会议文件,而被称为“林区的真正秀才”。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百废待兴,中央国家机关恢复正常运行,需要调入干部。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我于1978年到了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工作,踏上了学术研究和从政履职齐头并进的岁月征程。从地方基层到国家部委,从历史学专业到宏观规划工作,中间跨度极大,我以坚强的奋斗意志,攻克一个个难关,经历了一条治学与从政两者兼融、密切结合、相互促进的人生之旅。

在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从事政策研究和重要文稿起草,标志着我的学术研究和从政职业生涯的开启。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开始制定中长期规划,需要研究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我承担了这个重大课题,不分昼夜地整理资料、分析计算,很快形成了研究成果,提出合理化积累率为25%左右的建议,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并于1980年12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论降低积累率的必要性和途径》的论文。这是我首次从事重大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根本方向。我之所以在许多改革和建设领域,通过孜孜不倦地探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始终坚定地把握学术研究的政治方向。

古代先贤认为:“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需要认清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我认为,从事社会科学更应做到观天下以洞诸事,辨方向以审视是非。这关乎研究成果有无价值或价值大小,是否有有益于国家和人民事业发展。40多年来,服务推进改革开放,服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向。我之所以在许多改革和建设领域,通过孜孜不倦地探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始终坚定地把握学术研究的政治方向。

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发轫于经济体制改革,首要任务是计划体制的改革。于是,从1982年起,我着手梳理计划经济的理论和做法,撰写了不少研究报告和理论文章,与同事一道编写了20多万字的案例研究成果(“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并编写出《计划体制改革问题论争(1979-1983)》一书。撰写的部分理论文章在《经济研究》等权威刊物发表,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1984年、1985年全国“经济过热”,我及时深入研究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结构、政策等问题,写出多篇文章在《红旗》杂志等刊物上发表。1986年,我组织同事研究形成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到2000年发展构想和对编制我国长远规划的思考》这一研究报告,负责组织起草到2000年长远规划基本思路的主报告和10个分报告,其中不少重要研究成果被吸收到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在参加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和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我着重研究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和扩大对外开放问题。

1994年,我有幸进入中南海工作,一直到2008年,先后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研究室工作。这也是我直接服务中央领导和学术生涯中不平凡的一段经历。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我坚持以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为指导,推进理论创新、观点创新、政策创新。1995年6月,经过深入研究,我提出“实行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的建议,被写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文件。在国务院研究室,我的工作内容从经济向经济、社会、内政、外交等全局性工作转变,这是个重大挑战,也是拓宽我研究领域的重大机遇。我的不少重要研究成果,尤其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被吸收到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包括建议突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这是我较早提出并被中央采纳的重要思想观点。

从国家计委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研究室,再到国家行政学院和创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智库,我始终紧跟时代步伐,紧扣改革开放,牢牢把握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通过顽强的拼搏在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研究上取得较大成就。这也是我以往学术生涯乃至职业历程中最为重要的心得和启示。新时代新阶段,仍然需要坚守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深化对新经验新问题的研究、总结和提炼升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这是我矢志不渝的奋斗方向,也是确保学术之树长青的根本所在。

## 二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千百年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给理论创新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而要有所作为,则需要多方面努力,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扎根国情、认清国情、把握国情,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值得庆幸的是,在我步入学术生涯和职业生涯伊始,我们党就突出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我也就较早地花大力气对国情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写出了一批研究国情特点和由此出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文章。

1980年,我撰写了3万多字的研究报告《我国国情初步研究》,其中深入阐述了我国国情的主要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论方法,从国家地理环境、历史演变、文化传统、社会性质和经济状况等方面论述了我国国情的五大特点。该研究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经济研究资料》上发表后,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有40多份中央国家机关、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地方的刊物相继转载。党的十二大前,为贯彻落实党中央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思想,我还和同事们应红旗出版社邀请,撰写了《我国国情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一书,成为对我国国情持续研究和深刻把握的重要成果。这期间,我还撰写了《论我国国情出发进行现代化建设》一文,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围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

研究和把握中国基本国情,一个根本性的课题,是正确认识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阶段性变化中的主要特点。我围绕这个问题发表过多篇重要文章,其中2013年撰写的《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发表在《求是》杂志2013年第19期),就是有代表性的一篇。该文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内涵、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需要把握好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

一直以来,我始终坚持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力求做到“述古论今文无妄作,观天察地人不虚生”,这是我学术研究、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在中南海为中央高层领导服务期间,我发表的观点主张以及咨政建议,经常得到领导人“懂得国情,可靠管用”的肯定。

## 三

治学态度,决定着学术研究的成效。独立思考、唯求真,是严谨、科学的态度。我向来信奉“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尊重事实、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我努力做到每事问、每事想,坚持用事实说话,敢于较“真”,绝不盲从。人云亦云,绝不跟风、随波逐流,绝不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在实际工作中,凡是自己认为符合实际的,都敢于秉笔直书,也都敢于直言直谏。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期间,有一次我向国务院主要领导汇报工作时说:“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还不适于现在的工作要求,需要努力提高水平。”这位领导人说:“你能讲真话,敢于直言,这是你的长处,我身边就需要这样的人嘛!”这次谈话,使我深受鼓舞和触动,我经常告诫自己,什么时候都要求求真,绝不说假话、违心话,绝不不做表面文章、故弄玄虚,也绝不随心所欲、信口开河。

唯求真根本之道,在于调查研究。在治学和履职生涯中,我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摸清实际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听取多方面意见,力求全面、客观、

准确地了解有关问题的真相,然后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2005年关于农民工问题的调查研究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这年年初,国务院主要领导责成研究室牵头组织调研农民工问题,提出解决措施。于是,我负责组织成立了农民工问题专题调研组,成员包括党中央、国务院17个相关部门和8个农民工输出输入大省有关负责人以及农民工问题研究专家。经过10个多月对18个省的紧张调研,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和9次调研成果交流会,形成了《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和55个专题报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关重要文件,系统地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指导原则和主要政策措施。调研报告获第十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6年),我作序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一书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007年),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搞好调查研究不仅需要从思想上重视,还需要掌握基础理论和方法。2004年至2007年,我在国务院研究室任职期间,连续撰写多篇文章,阐述调查研究工作的特点、规律、做法,将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高度。比如,2004年的《提高调查研究水平 做好决策咨询工作》、2005年的《努力提高调查研究工作质量》、2006年的《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调查研究要多出精品力作》、2007年的《搞好调查研究贵在深入》。有的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关注,有的被中央部门转发作为干部必读读物。我会感到,调查研究是一个求实、求是、求解的过程,是一项严谨、缜密、科学的活动,其理论和实践都很丰富,既是求实求真的基本方法和途径,也是一个科学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体系,是一门内涵极为丰富的交叉学科。当然,求真务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需要树立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更需要有服从和坚持真理的品格和胆量。

## 四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人成功治学、成就事业的灵魂。我认为,学术研究的本质特征在于创新。“学术”两字,顾名思义,“学”就是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发明;“术”就是应用知识技能,创造新价值新事物。我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期间,有一次国务院主要领导来看望研究室人员时说,“我最希望的,是你们起草的文稿中有新思想、新见解、新材料”,“希望你们帮我收集各方面的新信息,用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来研究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国务院领导的嘱咐,给予我极大的教育和启迪,我一直铭记在心,努力做到在研究问题和提供服务中都注重新意、务求创新。

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创新、理论创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做到守正出新。守正,就是坚守科学理论的精髓,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被实践证明有益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的人类文明成果。40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解放思想、不懈探索,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在政府与市场、按劳分配为主体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中央与地方等关系的认识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特别是公有制为主体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我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提出并一向坚持认为: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必须做到“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全面认识公有制的确切含义。2003年,我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一文,对“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作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另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2004年,按照国务院领导的批示要求,我和国家发改委主任主持专项调查研究,提出《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后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作为国务院文件发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以国务院名义发布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学术研究中的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其根本要义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革除因循守旧的观念,主动适应客观世界的变化,学习运用新知识新技术能解决新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发展和治理问题日益成为

新的时代课题。从进入国家计委开始,我一直重视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教育、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研究从未间断。1981年,我便撰写了《关于我国实行义务教育制度的初步探讨》一文,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这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有关教育的论文,对于推动国家实行义务教育、设立“教师节”等重大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更是我近些年来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研究的重要方面。我主持了多项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大课题,发表了大量论著和演讲,有些文章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有些刊登于《求是》《光明日报》等报刊,有的被《新华文摘》等转载。我应学习出版社邀请主编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讲座》,我主笔写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和主要任务》,是比较早的系统论述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问题的专著,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我还应邀创设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和社会学院,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开展社会管理学科建设的重要建议并被采纳,推动了社会管理和政策列入国家学科体系。在国家行政学院,我领导成立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并担任会长,从行政体制改革理论与进展、政府自身改革与建设、国际金融危机与公共行政改革等方面进行学术研究,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从实现科学发展的高度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等大量理论文章,主编出版了《科学发展与行政改革》等多部著作。

已从发表的文章和著作看,我的学术研究与我的履职工作性质密切相关。实务工作需要理论研究,学术研究提供学理支撑;研究成果运用到实务工作中,又有助于提高政策研究和文稿起草的质量和水平。多年来,我一直注意把学术研究同本职工作巧妙地、恰当地联系起来。实践证明,把握好学术研究、理论研究与从政履职工作的关系,可以使二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回首人生路,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基本国情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方式研究、行政体制改革研究、对外开放研究,还是社会发展研究、社会治理研究、新型智库研究,我都秉持唯求真、守正出新的原则,正心修身、崇德治学,博观约取、朝耕暮耘,以此报效国家、服务人民。

【本报记者 潘如龙、周宇哈采访整理】

## 名家小传



魏礼群,江苏睢宁人,原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体制改革和法规司司长、党组成员兼秘书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党组书记,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应用经济学科评审组召集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前常务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主持或参加过党中央、国务院大量重要文件和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重要讲话的起草工作,负责或参与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课题研究120多项,取得了一大批对国家决策有重要价值的学术、科研、决策咨询成果。出版《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等个人专著20多部,主编著作130多部。



扫一扫 看视频

## 理论同期声



陈来:祖籍温州,当代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首批文科资深教授。著有《朱子哲学研究》《有无之境》《儒学美德论》《仁学本体论》等著作40余种,发表论文300余篇,担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等职。

大家都知道最早提出“浙学”的是南宋大儒朱熹。朱熹不仅提出并使用“浙学”的概念,而且还使用“浙中学者”“浙中之学”“浙间学问”这些概念,这些概念跟他使用的“浙学”概念类似或者相近。朱子提出的“浙学”,原指婺州吕学,后扩大到永康陈亮之学,又扩大到永嘉陈傅良、叶适之学,最后定位在南宋浙江的事功之学。

清初的全祖望则是在学术史的立场上使用和理解“浙学”这一概念,他对“浙学”范围的理解广大得多。

全祖望对南宋永嘉学派的渊源颇为注意。在《宋元学案》卷六说:王开祖,字景山,永嘉人也。学者称为儒志先生。最后说,是时伊洛未出,安定、泰山、徂徕、古灵诸公甫起,而先生之言实适与相应。永嘉后来问学之盛,盖始基之。这是认为,在二程还未开始讲学时,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等讲学刚刚产生影响,王开祖便在议论上和三先生遥相呼应,成为后来永嘉学派的奠基人。

全祖望讲到这段历史时,在《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序录”中说:

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考所谓“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门,其三则私淑也。而周淳、沈彬者又尝从蓝田吕氏游,非横渠之再传乎? 鲍敬亭等七人,其五人及程门……今合为一卷,以志吾浙学之盛,实始于此。

这就指出,在南宋永嘉学派之前,北宋的“永嘉九先生”(周行己、许景衡、沈躬行、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辉、蒋元中)都是二程学说的传人,南宋浙学的盛行,是以“永嘉九先生”为其开始。这就强调了二程学对浙学产生的重要作用,也把二程理学看作“浙学”的开创源头。“永嘉九子”是二程学说入浙的第一代。“九先生”之后,郑伯熊、薛季宣都是程氏传人,对南宋的永嘉学派起了直接的奠基作用。

照全祖望的看法,他认为永嘉之学的学统可远溯及二程,袁道洁曾问学于二程,又投其学与薛季宣,而从薛氏开始,向礼乐兵农方向发展,传为别派。此派学问虽为朱子所不喜,被视为功利之学,但其程学渊源不可否认。

总之,传统学术史认为,南宋浙学的总体格局是以程学为统系的,南宋的事功之学是从这一统系转出而“别为一派”的。

《宋元学案》对浙学的认识,其重要观点,一方面是强调周行己是北宋理学传入浙江的重要代表,“九先生”是浙学早期发展的引领者,永嘉学派是程氏的别传;另一方面,更指出朱熹一派的传承在浙学中的重要地位,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说者谓北山绝似和靖,鲁斋绝似上蔡,而金文安公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述《北山四先生学案》。

勉斋即黄榦,是朱子的高弟。北山即何基,鲁斋即王柏,文安即金履祥,再加上许谦,这些人都是金华人,是朱学的重要传人,也可以说,代表了南宋末年的金华学术。全祖望把“永嘉九先生”称为浙学之始,把“北山四先生”称为浙学之中兴,可见他不仅把程朱理学看作浙学的主体框架,认为程朱理学的一些学者在特定时期代表了浙学。这一浙学的视野就比宋代、明代的要宽大多了。于是,“浙学”之中,不仅有事功之学、有心学,也有理学。

【本报记者 吴旻 整理】

## 新思想在一线

# 以人才链助力新质生产力蓄势提能

王孟辉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链作为创新驱动的关键一环,是推动新质生产力蓄势提能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杭州高新区(滨江)始终贯彻“大人才观”,紧盯“三支队伍”中的高水平创新型人才和企业家队伍,做实“高”和“新”两篇引才文章,通过“引进一个人才、带来一个团队、兴办一个企业、带动一个产业”,把高层次人才科创成果转化为企业项目,成为浙江全省创新型产业的重要策源地。

“一站式”陪跑孵化,以人才创业实现“技术变现”。实现新质生产力提能增效,关键在于孕育孵化一批掌握核心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让关键技术从实验室变到生产线,人才创业是最佳“快车道”,必须从小孵化、长途陪跑,给予各类生产要素的帮助扶持,针对人才创业缺乏资金启动、无场地运行、少运营经验等实际,实行一站式、垂直化、全链条陪跑服务,为创业者在政策申报、法律财税、人才资源、经营培训和融资服务上提供全周期服务。高新区(滨江)积极探索人才价值实现路径,走出一条“人才带技术、技术变项目、项目融资金、实现产业化”的创新路径,实行人才层次精准洞察、人才孵化精准对接、人才需求精准触达和人才服务一键办理,从办公场所、研发创新、银行贷款、人才基金等方面全程陪跑,打造了一条从关键控制芯片设计研发、网络通讯、电子商务到网络安全、大数据、智能制造的数字经济全产业链,诞生了2601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培育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等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73家,以核心技术的攻关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领先领跑。

“一体化”布局引智,以产业成熟实现“人才集聚”。关键技术攻关突围,不可能旱地拔葱、异军突起,必须孵化于产业摇篮、成长于人才高地。反之,技术产业的集群发展、融合成链,也必须吸引更多顶尖人才、技术大拿“不清自来”。如何打造人才集聚的“磁吸效

应”,关键在于聚焦产业链布局人才链,形成以产引才、以才促产、产才融合的发展体系。高新区(滨江)围绕创新链、产业链部署人才链,集聚了包括极弱磁大科学装置、白马湖实验室等在内的“1+2+6+N”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拉开了“一园三谷五镇”的产业框架。围绕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人才雁阵格局拓展、引才育才品牌锻造、五大行动提质升级、人才工作整体智治等人才主动作为,聚焦智能物联、生物医药、高端装备、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人才需求,开展“才链全球”行动,面向全球发布“招募令”,加快布局企业海外人才驿站,以企业成链、产业集群优势吸引一大批高端人才“慕名而来”,为新质生产力转化升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动能。

“一揽子”服务留才,以生态宜居实现“引凤栖梧”。以人才链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秉持人才“办事无忧”“往来无忧”“生活无忧”理念,聚焦子女入学、医疗健康、住房保障等“关键小事”,精准做好政策推介、就业安居、成长关爱、感情联络等品质化服务,让人才能够潜心研究、安心创业。高新区(滨江)以人才需求和痛点为中心,实行“双创一件事”和“生活一件事”,着力打造宜居宜业的人才生态。加快推行人才安居“三年倍增”计划,探索“建设5050人才驿站”,推进海创基地建设“住创一体”“青居驿站”建设,推出现代产业社区模式,建设嵌入式幼儿园、嵌入式卫生服务站、暖企小站Bin-hub,让人才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打造“人才四季”活动品牌,持续开展“青春潮创”“青荷对对”“城市迎新”系列活动,丰富人才社交生活;推动人才服务数字化,开发“人才e达”小程序,打通“5050计划”申报人才安居、知识产权等服务系统,实现服务“一键触达、一码推送、一门办理”,通过打造“青”爱的城,近悦远来的才发展生态有效推动人才创新力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作为杭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滨江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